

中,扩张规模通常也会实现一种正负反馈机制的动态均衡,一种是以战养战和优势积累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逻辑,另一种是地理等诸多因素带来的投送能力的距离衰减,两者达到均衡之后就实现了短期相对稳定的规模。

总体而言,讨论机制的时间性有助于理解复杂的事件和因果关系,时间性通过机制所处的情境、节奏、顺序、时段等诸多时间要素对于政治社会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而机制也会通过正反馈机制、负反馈机制和均衡机制等诸多方式产生事件的各类时间形态。当然,充分理解政治社会的因果关系还是离不开具体的案例比较分析,仅仅从方法到方法的讨论时常会面临实际操作中的不适应,更加务实的做法是同步或交替进行具体案例研究来结合方法论思考,从而实现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学”与方法思辨中的“思”相结合。

伯罗奔尼撒战争与斯巴达和雅典 战略规划中的时间缺失*

莫盛凯**

时间是战略规划的内在要素,也是以往战略研究往往忽视了的维度。战略规划的时间维度是指战略目标在多长时间里达成或者维持。它是“知己”与“知彼”间的一个桥梁,沟通两者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目标。徐进认为,战略目标与时间的耦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帮助决策者确定合理的战略节奏和制定相应的战略步骤,没有时间限制的目标将导致执行者难以操作。^①

本文通过对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大主角斯巴达和雅典战前规划的考察发现,正是双方战略规划中时间维度的缺失导致了各自战略执行和操作的失败。除此以外,时间维度的缺失还导致了双方无法及时评估并更新各自的战略,而正是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际关系学院 2021 年度国家安全高精尖学科建设科研专项“伯罗奔尼撒战争与大国竞争的古典教益研究”(项目编号:2021GA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 莫盛凯,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① 徐进:《时间维度与战略目标》,《国际政治科学》2021 年第 1 期,第 1—6 页。

双方战略规划的同时失败，导致了战争最终持续了超过所有人预期的 27 年之久。

一 斯巴达的战略规划与执行

无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真实肇因究竟为何，决定开启这场战争的是希腊世界的传统霸主斯巴达。在公元前 432 年 7 月召开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斯巴达人以分组表决的明确结果，认定雅典的行为违背了双方在公元前 446 年到公元前 445 年冬季生效的《三十年和约》，从而做出了事实上要求开战的决定。这个表决结果在一个月后召开的斯巴达同盟会议上得到了大多数斯巴达盟友的支持。公元前 431 年春天，斯巴达人以一项入侵阿提卡的先发制人打击开启了实战。

严格来说，斯巴达人的战争决定没有什么大战略可言，它的战争决定更多的是群体激情的产物。作为斯巴达资深军事首长的阿基达马斯国王从始至终就不赞成对雅典的战争决定。尽管他在阻止公民大会支持发动对雅典战争的演讲中^①，似乎预见了雅典可能采用的新战略，但从战争爆发后他领兵入侵的实际操作来看，他的战争规划并无任何新意，演说中对雅典新战法的强调如果不是为了反对而刻意夸大，至多也就是个朦胧的认识。

战争受到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制约。古希腊社会是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落后社会。在一个通常需要九个人劳作来养活十个人的前工业化世界，农业是一切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关键。土地及其之上的作物，甚至被赋予了神性和道德，对于公民而言不仅涉及物质上的损益，还涉及他们精神上的利害关系。在公元前 700 年到公元前 450 年的大多数希腊内部陆战中，几棵祖传橄榄树遭砍伐的景象，足以引起它们主人甚至城邦间的战斗。^②

因此，蹂躏土地就成了希腊世界的一种公认战术，城邦间大规模毁坏对方农作物的破坏行为，是一种会激起重装步兵对阵对决的战斗挑衅。出动军队大范围地蹂躏阿提卡土地上的农获，激起雅典重装步兵的对阵对决，然后利用自身重装步兵独步希腊世界的惊人战斗力获得胜利，这就是斯巴达人有关战争的全部规划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11—115 页。

②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8—39 页。

和目标。按照这一传统规划,收获时节便是战役爆发点。^①至于这样的战争目标需要多久实现,斯巴达人压根就没有考虑过。在一个崇尚英雄和荣誉的社会,他们不认为一个能够坐视本土遭到对手蹂躏的城邦还能自诩帝国。甚至他们还认为,这将能激起雅典海外属邦的普遍反叛。于是,因为自我认知里的不可能,斯巴达人压根就没有为自己的战略设定一个时间目标。

然而,斯巴达蹂躏阿提卡庄稼的大战略在开战一周内就被证明是落伍了的。雅典已是一个拥有高墙庇护的城邦,战前就已动员阿提卡的农夫们带上他们最值钱的财物搬入了城墙内。尽管斯巴达的士兵们努力破坏阿提卡的土地及其上的农作物,但在技术落后的古希腊社会,完全依靠人力所能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6 万名蹂躏者在 20 万英亩农田中几乎做不了什么。^②十年阿基达马斯战争期间,伯罗奔尼撒军队在阿提卡逗留的总时长不过 150 天,平均每次最长不过一个月。即便伯罗奔尼撒的士兵能够全面破坏阿提卡的农业,雅典也依然能靠海上舰队的保障维持下去。

当然,斯巴达的战略本来也不是要全面摧毁并切断阿提卡的农业补给,伯罗奔尼撒士兵只破坏雅典城墙目之所及的农地,希望通过这样传统的挑衅行动激起雅典农夫们的怒火,实现重装步兵的对阵激战。因而,当伯里克利成功劝服雅典人继续固守不出以后,斯巴达的战略就已宣告了失败。尽管如此,由于没有给既定的战略目标设定时间限制,斯巴达人依然坚持在公元前 430 年 5 月下旬进行了第二次入侵,并在公元前 428 年、公元前 427 年和公元前 425 年继续重复了已经证明是无效的操作。

摆脱战略被动、迫使雅典妥协的恰恰是较早意识到斯巴达战略失灵而意图改变打法的伯拉西达。这位头脑灵活、不受传统束缚的斯巴达将领在开战多年后承认:“那时我们就战争怀抱的想法错了,我们以为我们将能迅速激起决战击垮雅典人。”^③公元前 424 年,在对战争僵局和被动挨打的绝望中,斯巴达人终于决定打破传统冒险一试,允许伯拉西达率领一支基本由雇佣兵和希洛人拼凑出来的

①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 页。

②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7 页。

③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0 页。

1700 名重装步兵队伍，纵贯希腊大陆，偷偷穿过色萨利，远征处在雅典粮食进口航线要道上的色雷斯地区。远征军一举夺下雅典在西北航路上最重要的据点安菲波里，彻底扭转了斯巴达开战多年来的被动局面，为公元前 422 年的成功议和奠定了基础。

如果说伯拉西达跳出既定战略把战线引向雅典遥远的海上后勤线的第一次战略调整是斯巴达摆脱战略被动的关键一招，那么尝试在自己不擅长的海上发展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则是帮助斯巴达获得最终胜利的另一次战略思维的突破。斯巴达之所以最终能赢得长达 27 年的战争，靠的是公元前 405 年洋河战役对雅典舰队的决定性胜利，而这则源自公元前 412 年，斯巴达在波斯资助下逐渐建立起来的海军与雅典海上力量的反复拉锯。也就是说，斯巴达在经过两段长达多年的试错以后，靠着对最初战略的两次大偏移，用了 20 年时间才被动摸索着找到了获胜的正确之道。如果它能给最初的战略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框架，在初战失利后及时调整战略，或许战争也就不至于延宕 27 年之久。

二 雅典的战略规划与执行

在一个由未经工事筑防的诸多村庄构成的农村社会里，战争逻辑的绝大部分多个世纪以来一向固定不变。^① 斯巴达就是一个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群山环绕中肥沃谷地的希腊城邦，它没有城墙，甚至也没有像样的街道，中心也仅仅是一个较大的不设防村落。雅典却已是一个不一样的发达商业城市，在其海上政策奠基人地米斯托克利的带领下筑起了城墙。雅典的城墙还通过三道长墙与位于比雷埃夫斯的港口连接了起来。因此，它虽是一个陆上城邦，却可以像一个海岛一样在隔绝周边的情况下依靠海上舰队几乎不受影响地生存。

雅典作为这场战争的另一方，有着相比斯巴达成熟稳健的战略规划。雅典城邦的民选领袖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时已连续执政十余年。他经历过与斯巴达间的上一场伯罗奔尼撒大战，领教过斯巴达重装步兵冠绝希腊的惊人战斗力，也见证过雅典人在战事一帆风顺时盲目自大地开启远征埃及的第二战场并惨遭全军覆没的惨痛教训。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他给雅典制定了一个退守城墙内

①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9—40 页。

固守不出的战略选项。也就是说,分散在阿提卡半岛上的雅典农民将全部撤入卫城的城墙内,雅典所要做做的就是凭借海上的供给坐等伯罗奔尼撒军队耗尽耐心主动撤回。

如果说斯巴达凭借自身陆战优势希望通过蹂躏雅典土地激起对阵决战是一种传统的歼灭战,那么,伯里克利追求的就是什么都不做,通过一种消极的消耗战,坐视贫穷的斯巴达因为始终找不到决战的机会打不下去而被迫求和。雅典公民则得益于城墙、长墙的保护,和海上舰队保障的物资和财富输入,能正常生活下去。战略史家德尔布吕克盛赞了伯里克利的这一伟大战略创新,这不仅是古希腊战争史上的一个全新思路,也是战略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创举,是第一个间接路线的大战略。^①理论上,这是一个能使雅典立于不败之地的完美战略,但实际上,由于缺少了时间限度的考虑,这一战略贯彻起来并不尽如人意。

首先,战争作为一项花钱的事业从来离不开财富的支撑,但雅典的消耗战略却有着远比斯巴达要高昂的战争成本。后世不少学者为此批评伯里克利的战略缺乏现实性。^②布索特依据雅典在不久前萨摩斯战争中的开支,计算了与斯巴达消耗战争的成本和雅典的财政收支,发现类似伯里克利在战争第一年的被动防御打法,雅典的年度军费开支就高达 2000 塔连特。这意味着凭借雅典现有的财政状况,战争最多只够打三四年,如果三四年内不能迫使斯巴达求和,那伯里克利的战略也就失败了。因而,伯里克利去世以后,雅典鹰派就迅速主导了对斯巴达同盟和伯罗奔尼撒本土的进攻性海上侵扰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卡根辩解说,作为不久前萨摩斯战争的指挥者,伯里克利不可能不清楚其中的财政问题,他在战争初期的保守,是因为他作为杰出的战略家是从分化打击斯巴达国内鹰派从而帮助巩固鸽派的政治考虑,而非纯粹的军事考虑做规划。^③但即便如此也无法否认,伯里克利最初也没有设想过斯巴达人能够把战事坚持到四年以后。他在开战前向公民大会阐述的战争规划中,^④从来没有设想过

① 汉斯·德尔布吕克:《战争艺术史:古典时代的战争》,姜昊骞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21 年版,第 71—75 页。

② 唐纳德·卡根:《阿奇达马斯战争》,李隽旻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 页。

③ 唐纳德·卡根:《阿奇达马斯战争》,李隽旻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5 页。

④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59—164 页。

要在伯罗奔尼撒本土建立据点或是颠覆斯巴达脆弱的政治制度，海上侵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给斯巴达人造成同等的破坏，“在心理而非物质上使之疲惫不堪”。^①如果是这样的保守打法，没有鹰派克里昂在公元前 425 年于斯法特克里亚取得的意外大胜^②，或许伯罗奔尼撒人还能把对阿提卡的入侵坚持得更久。

其次，战争也从不只是领袖们纯粹理性的对弈，它一直都是两个社会意志、心理和直觉的反复较量。古希腊社会高度崇尚荣誉和地位，一个拥有帝国的伟大城邦却龟缩在城墙内坐视另一个城邦在自己的土地上横行示威并蹂躏自己的土地和农获，雅典的公民们心绪复杂。如同后来亚西比德在蛊惑雅典人发动西西里远征时所说的——雅典依其本性只适合于大力进取的战略，倘若选择消极被动的态势，雅典将不复存在。^③ 尽管伯里克利凭借着自己长期执政开辟了雅典黄金时代累积起来的威望和雄辩口才，说服了城邦公民特别是城外的农民公民，忍受损失和情绪接受了他的隐忍战略，但这并不代表他们能够始终支持并拥护这一战略。伯里克利的战略需要假定，一旦战事延续超出预期，他的继任者要有像他一样的雄辩才能、政治经验和道德权威，能够驾驭保守的农夫和民主的极端分子，并能条理井然、持续不断地这么做，直到斯巴达人放弃为止。^④ 显然，他高估了自己的生命，也高估了他的继任者，更高估了公民们的耐力。

伯里克利所坚决反对也最担心的，就是雅典人在战争期间因为骄傲自满，而任意开启另一场战争从而导致两线作战的巨大风险。这一他从早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汲取的最重要历史教训，很快就在他身故以后被忍耐良久的雅典人一犯再犯。公元前的 424 年，被前一年的派娄斯战役胜利冲昏头脑的雅典人，很快就在第力安的陆上重装步兵对阵中重复了十余年前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在科罗尼亚遭遇的败绩。而在公元前的 415 年，雅典更是在与斯巴达的休战纷争中开启了西西里远征，并以 200 艘战舰和 5 万军人的全军覆灭，耗尽了最终的战略优势，剩下就只能依凭概率对半的战场搏杀来决胜负了。

① 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 页。

② 康福德认为雅典人在派娄斯和斯法特克里亚岛上取得的胜利纯属天赐的机遇。参见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74—96 页。

③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23 页。

④ 维克托·戴维斯·汉森：《独一无二的战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怎样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殷弘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7 页。

三 经验总结

作为战争的主要对手，斯巴达和雅典最初缺乏时间维度的战略规划都遭到了失败。在长达 27 年的不断纠正以后，战争最终以海军对海军的海上决战决出了最后的胜负，从而证明了另一项朴素战略原理——要结束僵持、赢得战争，就必须成功履行对称性的战略机理，那就是海上力量最终须由海上力量克制，陆上力量最终须由陆上力量战胜。^①当然，除此以外，斯巴达和雅典早期缺乏时间维度的战略失败，依然还有一些其他的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对于斯巴达而言，战略规划要有时间尺度才能及时检讨和回调止损。作为名将的老毛奇曾说过：“只有外行才相信能事先对战役全部过程作详细的规划，并能把最初的观念推进到底而不作任何改变。”^②斯巴达战前的战略规划在开战不久就已被证无效。如果说一年两年的坚持仍然值得尝试，那么当雅典在瘟疫中失去了领袖和数万人口后依旧坚守不出时，就应该及时考虑调整战略方向。如果能更早地开展战略上的反思检讨，向雅典在色雷斯的薄弱据点发起偷偷的远征，或许就不至于遭受斯法特克里亚的耻辱，至少阿基达马斯战争不会持续十年之久。

第二，对于雅典而言，执行战略目标既要有合理的时间限制，也要有战略定力。伯里克利为雅典精心策划的战争规划，在理想的条件下当然是一个万无一失的稳妥之策。但战略从来都不是真空地自外于国内基础，也不可能不顾经济成本的考量，更无法无视民众的忍耐限度。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伯里克利被动型的大战略要成功，战略定力是基础性的条件，一个既能领会战略精髓又能控制维系国内支持的替代继承人的发掘和培养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

第三，在有关战略的时间限度上，斯巴达的战略教训要求及时求变，雅典的战略教训要求能持之以恒，斯巴达和雅典一正一反的案例教训则再次证明，战略的精髓在于因时因势的灵活性，而不是恪守任何僵硬的教条或是理论。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是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的世界上适

① 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 16 世纪到 20 世纪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6 页。

② 钮先钟：《历史与战略》，上海：文汇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04 页。

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环境。^① 在战争瞬息万变的条件下，及时敏锐地甄别出该坚持和该舍弃的战略原理，恰恰反映战略的本质不仅是科学更是一种艺术的生动体现。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对于战争艺术根本不可能建造一套模式，足以当作脚手架，好让指挥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依赖它的支持。”^②

国家优先还是市场优先？美国产业发展中的次序问题

刘露馨*

因果关系是我们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时所追寻的宝藏，而判断因果性成立的前提就是确定原因与结果在时间序列上的先后关系。然而，社会生活中的很多原因和结果都是相互作用的，很难分清其先后顺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经常困扰着社会科学研究者。

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多年来一个重要的时间次序问题就是先有国家还是先有工业化的问题。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写道：“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② 在他看来，国家的干预是自由市场和工业化得以实现的前提，而对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来说，国家尤其是官僚制度的建设则是工业化的产物。当一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时，其社会结构变得越发分化和复杂，城市人口的集中和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削弱了国家此前对社会的组织和管理，国家需要对此作出回应，稳定的官僚机构才应

① 威廉森·默里、马克·格列姆斯利：《导言：论战略》，载威廉森·默里、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册），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2页。

* 刘露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②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页。